

哲學評論

PHILOSOPHICAL INQUIRY

第4輯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编
武汉大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PHILOSOPHICAL INQUIRY

哲學評論

第 4 輯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编
武汉大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

主 编 郭齐勇

执行主编 朱志方

主编助理 苏德超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必方 朱志方 陈立新 李佃来

吴根友 苏德超 范明华 郝长堉

段德智 郭齐勇 黄 超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评论·第4辑/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5

ISBN 7-307-04944-9

I. 哲… II. ①武… ②武… III. 哲学—文集 IV. B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5560 号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支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980 1/16 印张:21.5 字数:297千字 插页:1

版次: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4944-9/B·148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论文提要

儒家血缘亲情与人伦之爱的现代反思

丁为祥

儒家的血缘亲情本质上源于对人之有我的发现与承认。这一发现一方面确立了儒家人伦之爱的现实出发点；同时又撑起了儒家的超越性追求，使其不至沦为惟血缘是从的亲亲之爱。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儒学表现出即哲学即宗教、即世俗即超越的双重品格，同时又是其超越的人伦之爱与具体的权衡分辨之智高度统一的表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它经过与道家的分歧、与杨墨两家的论战以及与法家和集权政治的长期角力，近代以来，又经过西方科学、民主与自由、法治思想的批判性照察，至今仍不失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在于，我们能否通过创造性的转进，以使其成为现代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推进性力量。

也论儒家伦理道德的本原根据

文碧方

刘清平先生认为由于儒家伦理既把血亲伦理规范作为一切道德行

为的本根基础又赋予它以至上的性，故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深度悖论之中。本文拟将刘先生的这一观点以及其他相关看法置于传统儒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来作一探讨，以期能对儒家在有关该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有所澄清。

虚妄的“本相”

——驳黄裕生先生所谓的“本相伦理学”并兼及“西化”思潮

胡治洪

本文从意识的实质、人类及个体发生以及人类历史现实等方面，批驳了所谓“本相伦理学”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的理论悖谬；进而从人神关系、教俗制度以及文明交通史的角度，质疑了以基督教文明作为所谓“本相伦理学”之典范的观点，并通过铺陈儒家文献中所富蕴的、特殊与普遍一体打通的伦理思想，回应了将儒家伦理学判定为“角色伦理学”甚至“违法的伦理学”的论调；基于以上论述，揭示了将所谓“本相伦理学”（即基督教文明）与“角色伦理学”（即儒家伦理学）对置而扬前抑后的话语中所隐含的“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的思想背景，指出了这种思想的一贯偏颇性及其现实有害性。

认识与存在

杨国荣

认识与存在常常被分别视为认识论和本体论讨论的对象，这种理解在逻辑上每每又以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相分为前提。就其内涵而言，认识与存在无疑包含某种差异，在一定意义上，对它们分别地加以考察，也有助于深入地把握二者的不同规定。然而，如果将区别引申为分离，则容易导致对二者的抽象理解。从现实的形态看，认识过程总是以存在的敞开为其题中之义；认识的展开，也难以离开本体论或形而上的视

域。广而言之，认识领域的存在不仅指向对象世界，而且涉及人自身，认识与存在的相关性则相应地展示为“知”与“在”的互融。认识的如上图景所蕴含的更深沉意义，是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

荆公新学与道家思想

萧汉明

王安石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以道家的理论构架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他以道的体用关系论述了道是元气的两种不可分割的存在形态，由此建立了他的自然观。常道是道之体，是元气的静止状态，是天地万物之总根源；而非常道则是道之用，是元气的运动状态，是冲气生养万物的自然过程。进而他又从道的本末关系出发，认为在无为有为之间，无为为本，有为为末；在教化与行政之间，教化为本，行政为末。用于治世，若本强末弱，则应当扶末；若本弱末强，则应当扶本。通过这样的治理，以使本末得以相称。至于礼乐刑政与心性的关系，他认为礼乐刑政根源于心性，心性又必须经过礼乐的规范与育养，二者不可分割。

阳明学者的生死关切

彭国翔

通常认为儒学传统忽略生死尤其死亡的问题，事实上，这一判断有失准确而难以涵盖整个儒学传统。本文对中晚明阳明学者生死关切的考察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指出儒家传统讳言生死的情况在中晚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对生死尤其死亡的关切构成广大阳明学者问题意识和话语讨论的焦点之一。其次，从佛教对阳明学的影响以及明代儒家学者险恶的政治生存环境这两方面探讨阳明学者关切生死问题的原因所在。最后，说明阳明学者的生死解脱之道不同于佛教而有其自身的特征，其所以如此，根源在于儒家与佛教具有不同的本体论基础。儒家虽然可以在

境界论的意义上接受并吸收佛教“无”的智慧，但在本体论上却不能放弃道德本体“有”的终极信守。由本文可见，和许多宗教——伦理传统一样，儒家对死亡这一人类普遍的终极关怀同样可以提供一笔丰富的精神资源。

造就美国：后现代主义与罗蒂对文化左派的批评

Michael Peters 著，胡佳译，朱志方校

罗蒂认为启蒙运动的哲学路线与政治路线没什么联系。和欧洲亲戚不一样，“美国的自我创造实验”的成功，并不依靠也不需要任何哲学上的保证和辩护；哲学和诗歌一样，只不过是另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按这种观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能够讲述一个民族历史的激动人心的故事和创造这段历史的伟大象征，以此作为它竞争政治领导权的方式。叙述民族的自我创造的故事，应该立意于这个民族能够尽力做到什么，而不是这个民族已经是怎样。也许，这就是罗蒂和欧洲后尼采主义者在文化和风格上的最关键的区分：罗蒂相信，他的民族历史的叙事颂歌是激发未来希望的最佳方式，而不是“沉浸”于那些令人烦恼或羞耻的情节。

“除非”，“直至”与杀害的时间

Lawrence B. Lombard 著，杨云飞译，朱志方校

对 U-U 推理的谬误进行分析。

荣格的原型与西方形式传统

潘道正

为了说明集体无意识，荣格提出了原型概念，但原型本身仍需要说

明。从词源的考察到柏拉图的理式，再到康德的范畴，在西方的形式传统中，荣格先是发掘了原型的纯粹形式的特征，后又赋予原型先在形式的内涵，原型最终被解释为一种精神力量后又回到了最初神秘的不可知。然而，在一次次否定中，原型非但没有消亡，反而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并最终成了荣格原型理论最基本的范畴。

限定性与知识问题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论研究

黄 敏

在知识考古学实践及其对知识考古学所涉及的有关问题的探讨中，福柯对知识的基础问题进行了思考。这项工作一方面包括福柯对现代人文科学的批判性反思，进而否定了关于知识的基础主义，另一方面，福柯试探性地给出了自己的研究纲领。本文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福柯实际上改变了为知识奠基的基本进路，即，从同一性问题向限定性问题转换；但这种转换并不允许福柯给出一种新的辩护方式，福柯实际上走在一条他自知不通的路子上；尽管如此，福柯对知识问题的深度探测使得整个问题的基本要素展现出来，进而推动了问题的转换。

问题的基本功能

张掌然

问题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本文探讨了问题的基本认识论功能，并把它分为4类：定向功能、组织功能、激发功能、评价功能。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贡献

荣开明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归根结底是因为邓小平创立这一理论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有着重大的创新。这些创新是全面的系统的，其中最为突出的体现是四个方面：思想路线的新阐述；“三个标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的新运用；矛盾分析法的新发挥；改革方法的新创造。

对“新型中国人”的呼唤

——评邓晓芒《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

丁三东

《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是一本论文集，它收录了邓晓芒近年来发表和未发表的诸多论文。这本书涉及的范围极广，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不过事实上，邓晓芒的工作并不是任意的，从本书展示出的广泛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为自己的思想设定的任务。

跨世纪的哲学老人——伽达默尔

——为纪念他逝世两周年而作

何卫平

伽达默尔（1900～2002）是继胡塞尔、海德格尔之后，西方20世纪中叶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当今世界级的思想大师。他对欧洲大陆传统解释学的刷新和推进，在人文科学及文化各个领域里都引起了广泛的革命性的影响。

主持人的话

□ 郭齐勇

本辑刊2002年第1期曾发表了刘清平先生《无根的仁爱——论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一文。该文认为孔孟儒家赋予特殊性的血缘亲情以“惟一本根的意义”和“至高无上的地位”，致使仁爱理想“处于一种缺失无根的状态”。近年来，我和友人曾与有的论者就“亲亲互隐”及由“亲亲互隐”引发的儒家伦理等问题展开了争鸣，详见《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刘清平文、第10期郭齐勇文、第12期穆南珂文，2004年第7期郭齐勇与龚建平文；《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黄裕生文，2004年第1期郭齐勇与丁为祥文；杨泽波先生在《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等。

这场争鸣从如何理解孔子的“父子互隐”、孟子有关舜的几则讨论开始，涉及如何历史地评价儒家伦理及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的问题。有的论者以抽象的、他们自以为的西方价值来评价儒学，以为对亲情的维护仅仅是儒家或中国传统伦理的特殊性，想当然地把儒家伦理简单化、平面化、妖魔化，夸张为“亲情惟一”或“亲情至上”，视之为古代法

律的对立面（黄裕生所谓“违法的伦理学”），那当然更是现代化的法治的绝对对立物了。吊诡的是，儒家的这些主张、中国伦理法系的精神及“亲属容隐”制度与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直至今天的法律并不相违，相反，这恰是具有人类性的，符合人性、人道的，因而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史专家范忠信教授早就有了厚实的研究成果。“父子互隐”中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与维护的因素。让亲人从亲人的证人席上走开，恰恰具有现代性，这对扬弃“五四”、“文革”以来的亲情沦丧有长久的价值，对修订现行的、沿袭革命法律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有着现实的意义。

有的论者例如黄裕生先生信誓旦旦地宣称：“爱有差等”是最黑暗、最荒诞的思想，导致整个儒家伦理学陷入了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黄先生完全是隔着玻璃看自家传统，以其臆造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妄评儒学，断章取义，否定儒家的“仁爱”的普遍性。他认为只有基督教的“博爱”才有普遍性，儒家的伦理学只是角色的、关系的、功能性的、他律的伦理学，只具有特殊性，在当代毫无正面价值，只能被抛弃。他把一神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说什么“每个人首先是与惟一的神发生关系，才与他人发生关系，而且人与神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前提；人是在与神的关系中获得绝对尊严、绝对权利与绝对责任，因而尊严（绝对的目的性存在）法则、权利法则、责任法则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基本法则”^①。他在其两万余言的长文（《中国哲学史》很少发过这么长的论文，是文又同时发表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所办的辑刊《哲学评论》上，附带说一句，敝院系所办的《哲学评论》始于2001年）中几处引用《圣经·马太福音》，指出只有上帝、耶稣的爱（以及对上帝、耶稣的爱）才是有绝对原则的、普遍的爱。“谁对亲人的爱超过对耶稣的爱，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心里没有绝对原

① 黄裕生：《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则，没有普遍的爱，他也就不配当耶稣的门徒。”^① 为了强调这一点，在同页同一段落中他又重复说：“如果一个人爱他的亲人甚于爱耶稣，他也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全智爱独一的上帝，因而也不可能真正爱人如爱己，因此，他当然不配当耶稣的门徒。”黄文所说的够资格成为普遍伦理学的基石，即是上述所谓“绝对原则”，由此才能带来社会的正义、公正。这与他在同一论文前半部分强调的“绝对自由”、“绝对权利”、“人的本相存在”、“意识本身”、“纯粹意识”、“一切存在者的显现都必须以纯粹意识的自识存在为前提”、“每个人都存在于自由意识中，因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的自由存在”的所谓普遍伦理学的前提适相矛盾。

这使我们想到了孟子对墨者夷之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批评。程伊川曾就此有所讨论，指出对张横渠的“民胞吾与”不能理解为“兼爱”。这里有诸多常识性的错误。根本上，儒家“仁爱”的论说是在本体论、存在论上才能理解的，在实践生活上才能体证的，而论者往往将其视为西方知识论的话语，抓住只言片语，斩头去尾，任意宰割，当然如隔靴搔痒。

属于常识性错误、至今还被不少论者奉为圭臬，成为思维定势的，还有黑格尔所谓孔子的主张只不过是俗世伦理、常识道德，罗素所谓中国伦理不注重公共义务，梁启超所谓中国传统伦理注重“私德”、不注重“公德”等。这些都需要认真地辨析。至于有的论者把“私德”说成“私欲”，则更是荒谬绝伦。

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的差别，大小戴《礼记》都有“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的论说，在实践上更是如此。门内以恩服为重，门外以义服为重，私恩与公义是有明确界限的，怎么能说儒家只讲亲情，不讲正义、公正、公德？怎么能把今天贪污腐败的根子找到儒家伦理上？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栽赃陷害，糟蹋圣贤，糟蹋自家传统

① 黄裕生：《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精神。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价值系统，其价值理想、人格典范与千百年来儒家仁人志士的实践行为，对国事民瘼的关切，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财富，而且正在成为我们新时代的精神要素。儒家伦理中自有与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相接殖的因素。儒家讲的“私”与“己”是不同的概念。至于“存天理，灭人欲”是不是要灭绝人之所有的欲望，也是需要辨析的。与此相关，“吃人的礼教”说，也是“五四”以来的陈词滥调。礼教，特别是宋代以后的礼教，包括吕子乡约、朱子家礼在内，恰恰适应了历史上最大的社会转型（由唐而宋），有利于民众的文明化，对中日韩诸国走上现代化道路都作了铺垫，其中有其现代性因素。东亚有关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者中有许多专门家在研究，且成果颇丰，兹不赘言。

有的论者以为，所有非西方的伦理资源都不具有现代性、普世性。有的先生，例如黄裕生在前引文章中说，儒家仁爱不是普遍的，缺乏普遍教化能力而无力承担起世界史，换言之只有他心目中的基督教伦理是惟一具有现代性、普世性的。那么我倒要请问，是不是各族群、各文明的传统伦理在当代都没有用了，只能照搬基督教的或近代西方的伦理？这可不可能？他们的预设，仍然是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儒家与基督教的二元对立斗争，不知道彼此的互涵、对话与沟通。所谓普遍性伦理从何而来呢，只能来自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吗？基督教伦理是一成不变的吗？康德伦理与儒家伦理完全不可通约吗？

本栏目发表的三篇论文，深入探讨了儒家血缘亲情、人伦之爱与儒家核心价值“仁爱”的真实意涵，全面地、立体地而不是浮泛地、单维地论述了儒家最基本的观点的形成与发展，解读了儒家伦理的复杂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的张力与配合，诠释了先儒对人之性分所涵之仁义以及人之践仁行义的绝对性、普遍性、无条件性的强调，来凸显儒学的这种超越性、终极性和宗教性，论证了“仁”与道德的“心性”究竟为何物，梳理了先秦、宋明儒有关“仁”、“亲亲”、“孝悌”的论说，将儒家伦理与康德伦理学作了比较，讨论了所谓“本相

伦理学”的缺失和把儒家伦理仅仅视为“角色”“关系”伦理的错谬，指出所谓“普遍伦理学”的建构，一定要在各种文明传统中发掘具有人类共同性的价值观念，通过文明对话，将这些原本“特殊”的观念推扩、提升到“普遍”的层面，这当然包括吸取儒家的“仁爱”在内的各族群的伦理价值，将其中人性、人道的内容、因素作创造性转化。

长期以来，在人类各族群起了广泛作用的，作为价值指导并维系世道人心的精神性资源，都具有当代的、普遍的意义。我们要以健康的心态，体认合乎人情人性的自家伦理资源（包括儒家儒教、道家道教、佛家佛教）的深长久远的价值，肯定各宗教、各族群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现代意义。

时下我们确实犯有“失语症”。只会转述、重复人家的话。而对于自家的、人家的论说，却缺乏深度的全面的理解。“五四”以来最大的毛病就是简单粗暴地对待自家的文化精神遗产，习惯于以偏概全，一言以蔽之地把需要分析、转化的价值系统，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中庸”等理念及其背后的“天”、“天命”、“天道”等范畴都当做负面的或历史博物馆里的东西，而不肯虚怀体认。我们在认真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时，也要学习西方近代知识分子认祖归宗的精神，把与古希腊罗马本无直接联系的近代西方文化，往前延伸，接上古希腊罗马的源头，学习他们对自家大小文化传统的尊重与珍视，包括基督教（我这里用广义）伦理传统对西方族群、社群的养育。他们尊重他们的伦理传统的教育，使之对今天的社会、青少年继续发挥作用。我们呢？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抛却自家无尽藏”呢？在这一方面，即在当代重视本土伦理资源的护持、活用与本土伦理的教化方面，真是要向西方学习。对于本族群文化传统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尊重并不是矛盾的，关键是要有深入的理解与切实的分析，不要只停留在表层，重复一些“五四”、“文革”以来似是而非的独断论。我们希望我们的青年，适当地与时髦的东西保持一点距离，稍微增加一点独立思想的能力。

Contents



哲学评论

儒家伦理研究专栏

- P1 主持人的话 郭齐勇
- P1 儒家血缘亲情与人伦之爱的现代反思 丁为祥
- P50 也论儒家伦理道德的本原根据 文碧方
- P98 虚妄的“本相”——驳黄裕生先生所谓的“本相伦理学”
并兼及“西化”思潮 胡治洪

* * *

- P123 认识与存在 杨国荣
- P148 荆公新学与道家思想 萧汉明
- P171 阳明学者的生死关切 彭国翔
- P189 造就美国:后现代主义与罗蒂对文化
左派的批评 Michael Peters
- P208 “除非”,“直至”与杀害的时间 L. B. Lombard
- P232 荣格的原型与西方形式传统 潘道正
- P243 限定性与知识问题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论研究 黄敏

P263	问题的基本功能	张掌然
P272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贡献	荣开明
P294	对“新型中国人”的呼唤 ——评邓晓芒《中西文化视域中真善美的哲思》	丁三东
P298	跨世纪的哲学老人——伽达默尔	何卫平

儒家血缘亲情与人伦之爱的现代反思

□ 丁为祥

在世界各大思想谱系中，儒家以其即哲学即宗教、即世俗即超越成了一种极为典型的特色。这一特色一方面决定其在普遍与特殊、世俗与超越之间双向地“即是”，但也往往使其容易遭到双向的否弃。比如从宗教的角度看，基督教要人皈依上帝，佛教要人斩断尘缘，儒教则要人孝敬父母、泛爱亲仁，这自然显得不够宗教的格；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黑格尔说孔子的《论语》“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①，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也主要是将中国历史上“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②，显然，从哲学的角度权衡，儒学似乎也不大够哲学的条件。本来，这双向的“不合格”可能正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但在西方一元视角之下，却难免使国人产生“事事不如人”的心理，所以20世纪不仅有“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有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文革”……这种种运动、思潮无不表现着国人急切地甩脱历史包袱以获得承认的心理。但当这一切都成为过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9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页。